

從《黃旺成先生日記》看大正時期臺灣的家屋清潔與家庭衛生*

李朝凱**

摘要

本文透過審視大正時期《黃旺成先生日記》中所見的家屋清潔、家庭衛生的演變，一方面說明臺灣總督府透過公學校教育、衛生展覽會對臺灣民衆家庭衛生觀念的養成，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衛生知識在社會網絡中再傳播的過程。

接續說明總督府推動的春、秋季大清潔日，對於家庭衛生的實踐具有重要性。黃旺成每年在春、秋季大清潔日的生活體驗與記述，展露出臺灣總督府藉由衛生警察與保甲制度執行家屋衛生檢查的生動情境。這種強制推動臺灣民衆打掃與消毒店家的內外的衛生措施，逐步將家屋清潔習慣植入日常生活之中。

* 本文承蒙張素玢、蔡錦堂、陳逢中等教授以及學友莊勝全、坂井洋、陳雅苓、陳家豪等人的建議與協助，又得到匿名審稿委員諸多寶貴意見，文責自然個人承擔，在此特申謝忱。

** 莆田學院媽祖文化研究院副教授

來稿日期：2020年8月15日；通過刊登：2024年4月16日

最後，透過日記可以看到大正時期居家生活中更常面臨的是各種寄生蟲病，反映了當時家庭衛生與飲食衛生知識尚未齊備，因此日常生活中頻繁地上演著一場又一場的「蟲蟲危機」。

關鍵詞：大正時期、日常生活、家屋清潔、家庭衛生、大清潔日

一、前言

日本領臺初期，佐倉孫三（1861-1941）撰文描繪來到臺灣所見的市街環境概貌，其云：「溺水汨濫、豚鵝雜遘，異臭撲鼻，使人發嘔吐，而臺人毫不顧。且家無廁圍，街路設一大廁場，人人對面了之，亦甚可厭。」顯然佐倉氏對於臺灣市街與居家環境衛生，留下污穢不堪、難以忍受的深刻印象。¹佐倉孫三認為日本人來到臺灣後致力於推行市街的清潔法，對比昔日臺灣傳統街衢塵埃縱橫的髒亂情形，可以說是有天壤之別的差异，企圖營造出日本時代初期臺灣市街與居家環境出現鉅變的社會景象。日本時代初期的市街與居家環境衛生情況是否如佐倉氏所說的從此有著大幅度的改善，我們可以從留存的《黃旺成先生日記》等史料加以尋繹，尋求可能的答案。

《黃旺成先生日記》的傳主黃旺成（1888-1979），初名陳旺成，因父親陳送（1862-1921）入贅黃家，但是申報戶口時將黃旺成填為陳姓，故早期姓名為陳旺成，直至戰後才改成母親的姓氏黃姓。黃旺成畢業於新竹公學校及總督府國語學校師範部，受過新式教育洗禮，屬於有別於傳統社會孕育出來的「乙未新世代」。²「乙未新世代」的青年包括蔣渭水（1888-1931）、蔡培火（1889-1983）、林呈祿（1886-1968）、蔡式毅（1884-1951）等人，他們融合了舊式漢學素養與新式西方教育，帶領臺灣民衆走進摩登文明的時代，同時也是引入民主政治運動、啓蒙文化思潮的奠基者。黃旺成既是「乙未新世代」的社會精英，同時也具有新竹地區公學校教師、商號店主等身分，以黃旺成作為研究對象，可以反映新式衛生教育與觀念自上而下落實於地方社會的具體情形。

1 佐倉孫三，《臺風雜記》，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107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頁15。

2 乙未新世代意指出生於割臺前後數年間，一方面接受新式教育，另一方面還與舊時代有所接觸者。乙未新世代青年採用非武裝的政治社會運動抵抗殖民政府壓迫。周婉窈，《日據時代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臺北：自立報系文化出版部，1989），頁23-24。

從日記觀看殖民政府在基層衛生的運作情形，已有范燕秋等學者以傳統社會精英張麗俊（1868-1941）撰寫的《水竹居主人日記》之研究成果，呈現傳統社會精英對於近代衛生觀念流入臺灣的感受。³近十餘年來持續出版的《黃旺成先生日記》受到學人注意，其重要性值得加以重視，例如沈佳姍以《黃旺成先生日記》探究日本時代臺灣民間對於兒童疾病與照護等課題。⁴

黃旺成留存的日記內容一方面引領我們走入日本時代施行新式西化衛生教育的現場，另一方面也可觀見新式西化衛生觀念落實於黃旺成的日常生活體驗之中。我們在黃旺成的日記中可以看到總督府防疫醫官在新竹公學校舉行地方衛生會議的記述，⁵也有防疫組合監督雇用的苦力清掃水溝，轄區警員到家中調查種痘等基層衛生措施；⁶或是各地霍亂、日本腦炎等疫情爆發時，禁止販賣魚貨以及施行交通管制等防疫政策運作情形。⁷同時，也能觀見當時人們對於腸胃疾病與飲食衛生的關心，⁸以及黃旺成認為身體健康與飲食、運動習慣息息相關等近代衛生保健觀念。⁹

3 范燕秋，〈由《水竹居主人日記》看殖民地公眾衛生之運作〉，收入范燕秋主編，《疫病、醫學與殖民近代性》（新北：稻鄉出版社，2005），頁151-178。

4 沈佳姍，〈從《黃旺成先生日記》看臺灣民間的兒童疾病及照護（1912-1925）〉，《空大人文學報》27期（2018.12，新北），頁35-98。

5 如1917年12月1日（土）：「本日講堂各校長、公醫並荒井防疫醫官衛生會議」，荒井惠當時的身分是總督府防疫醫官。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六）》（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0），頁221。

6 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五）》（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9），頁123-124。

7 1923年3月7日：「昨日來臺中腦炎猖獗，至本日已交通遮斷五、六次。」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十）》（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2），頁99-100。另可見：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七）》（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0），頁80、202；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一）》（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3），頁36。

8 「四奶一昨日來患腸炎，叫苦連天，東家頗怨其不肯注意食事也」、「自製了一大盆的愛玉子，都用滾水調製，以重衛生」，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九）》（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2），頁162；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三）》（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4），頁248。

9 如1923年1月2日：「予本弱質，近年來幸得依持健康狀態者，乃予之飲食、運動得宜也。」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十）》，頁2。

私人撰寫的日記明顯有別於官方報刊雜誌刻意發出的政治宣傳聲音，具有較高的客觀性與民間色彩。¹⁰進一步來說，《黃旺成先生日記》中體現的衛生觀念也有異於同樣是私人日記的《水竹居主人日記》，張麗俊對於衛生等新觀念的理解，像是：「嘗謂天災流行，何地蔑有，聞義能徙，盡人宜先，是人誰無向義之心，第勇與無勇之別耳。蓋尚義莫要於衛生，衛生莫要於撲疫，此救災恤鄰之義所由起也。」用一種以新舊糅合的方式解讀「衛生」的意涵，¹¹《黃旺成先生日記》中則未見這種糅合方式詮釋新式西化之觀念。

本文藉由受過近代教育洗禮的社會精英，觀看大正時期臺灣居家環境衛生的變化。透過時人日記的記載，不僅可以瞭解殖民政府權力進入私人居家空間領域的過程，以及被統治者的心理感受；另一方面也能夠反映社會精英居家環境衛生觀念的變遷、家屋清潔習慣的養成以及各類疾病的挑戰，更為貼近大正時期的家庭衛生生活之樣貌。

二、家屋清潔與家庭衛生

（一）清代的家屋清潔與家庭衛生

我們若是時間向前檢視清代臺灣的文獻史料，不難發現地方官員對於居家環境衛生的治理措施甚少，僅有如乾隆年間臺澎兵備道張挺（1738年舉人）留下嚴格執行清潔居家環境的個人政績紀錄：「始至，嘗令街坊清衢道，掃除

10 該日記起於1912年，終於1973年，中間缺少1918、1920、1932、1938、1940、1944、1947、1948、1952、1954、1965、1967、1969等13年，共計有49年的日記。日記由1912-1915年2月主要用日文寫作，之後主要以漢文方式書寫。就公眾衛生史的角度而言，1918-1920年是西班牙大流感的重大時段，《黃旺成先生日記》缺少1918、1920年的部分，未如《水竹居主人日記》記述相關情事，也未能觀察相應的清潔消毒等情形，著實可惜。許雪姬，〈編者序〉，收入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一）》（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8），頁ix-xii。

11 詳見1908年4月30日之記載，張麗俊，《水竹居主人日記（二）》（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頁40。

糞穢；頃之出見，居民門首有不鑿者，笞其人，由是道無留穢。」張挺的政令應是基於城市街道的糞穢難聞而對臺灣府城採取的臨時性措施。¹²又或如光緒13年（1887）劉銘傳（1836-1896）在臺北城和滬尾等通商口岸設置「清掃街道局」，巡視住戶逐日清掃溝渠，勸諭不得堆積渣穢，以維持臺北城內的整潔。¹³時任臺灣道的唐贊袞也同樣注意到清末臺南府城溝渠鬱積的問題：

臺南縣城內外水溝，自前臺灣道劉蘭舟觀察籌款修築，積久淤塞，且舊基亦多傾圮。時屆夏令，地防阻逆，穢氣鬱蒸，亟宜疏濬重修，以利水道，而弭疾疫。¹⁴

由此而論，清末的地方官員由於尚未具備近代化的公共衛生觀念，認為疫病流行是因為臺灣氣候溼熱、瘴癘之氣、性俗淫邪，以及南方人、北方人體質差異等原因，¹⁵防治之術的重心在於「戒色慾、節飲食」等生活習慣上。¹⁶

西方傳教士馬偕（George Leslie Mackay, 1844-1901）來到臺灣後認為當時臺灣瘧疾的猖獗，與民衆住屋周遭的水溝阻塞，污水流竄，造成蚊蠅環繞有關，於是提倡地方民衆芟除雜草、疏通水溝，因而讓滬尾地區蚊蠅較為減少，¹⁷但是受到馬偕個人傳教重心等限制，影響地區應該較為有限。再者，當時任職於臺灣的外籍海關醫員同樣認為瘧疾等疾病除了和個人衛生習慣有關，

12 謝金鑾、鄭兼才，《續修臺灣縣志》，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140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頁127。

13 李佳卉，〈日治時期臺灣「污物」處理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頁34-35。

14 唐贊袞，《臺陽見聞錄》，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30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頁124。

15 郭侑欣，〈清代臺灣文獻所反映的疾病經驗與文化想像〉（彰化：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11），頁204-225；戴文鋒，〈《海關醫報》與清末臺灣開港地區的疾病〉，《思與言》33卷2期（1995.6，臺北），頁157-213。

16 福州還珠氏，〈客路須知〉，光緒11年（1885）12月勒石於臺北府署大門。參見邱秀堂，《臺灣北部碑文集成》（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1983），頁17。

17 陳宏文，《馬偕博士在臺灣》（臺北：中國主日學協會，1998），頁74。

也是受到地表發散的有害氣體所導致的疾病，比如淡水關醫員禮德（Alexander Rennie）認為外國人比較少罹患熱病的原因，是有比較妥適的住屋空間與衛生環境的改善；東海岸阿美族人健康的原因，是其住屋的地板離地面2呎高，有厚實的茅草屋頂抗大雨，並且住屋舒適整潔。¹⁸

綜合而言，可以觀見清末西方傳教士與海關醫員在市街與家庭衛生觀念上與清帝國的地方官員仍有相似之處，都是以「瘴氣論」（Miasma theory）來解釋疾病的起因，¹⁹尚未汲取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期西方新發展的「細菌論」（Germ theory）。²⁰職是之故，清代臺灣由於在衛生知識體系上以「瘴氣論」為核心，尚未能夠留意滅除細菌與家庭衛生之間的關係。

（二）明治年間的家屋清潔與家庭衛生

日本領臺初期，在《征臺衛生彙報》中對於日軍患上臺灣熱病的原因，是由於「有機物的腐敗、適當的溫度、溼度是誘發的三要素」，認為疾病是由熱帶氣候所造成。然而，隨著20世紀初期西方「熱帶醫學」的開展，特別是細菌學、寄生蟲以至原蟲學的發展，才逐漸區分為氣候影響以及傳染疾病等不同因素，並隨即將有關瘧疾方面的細菌學等西方新知，運用於改善在臺日軍的健康問題。²¹

18 蘇芳玉，〈清末洋人在臺醫療史：以長老教會、海關為中心〉（桃園：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頁124-125；蘇芳玉，〈清季臺灣地區疾病的治療與觀察：外國海關醫員的觀點〉，《中央大學人文學報》40期（2009.10，桃園），頁1-11。

19 李尚仁，〈十九世紀後期英國醫學界對中國癩瘋病情的調查研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4卷3期（2003.9，臺北），頁451。

20 劉士永，〈「清潔」、「衛生」與「保健」：日治時期臺灣社會公眾衛生觀念之轉變（修訂稿）〉，收入李尚仁主編，《帝國與現代醫學》（臺北：聯經，2008），頁271-323；皮國立，〈「氣」與「細菌」的中國醫療史：民國中醫外感熱病學析論〉（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11），頁41-63。

21 范燕秋，〈日本帝國發展下殖民地臺灣的人種衛生〉（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01），頁167-169。

在衛生政策上，殖民政府依據「生物學原則」的統治，臺灣人居住的市街盡量維持「舊慣」，施行較不深入的衛生措施，而另外闢建日本人居住的新市街。²²明治32年（1899）坪井次郎醫學博士來臺灣考察各地城市的衛生情形，觀察到臺灣的衛生狀態與日本內地差距甚大，臺灣氣候不利於健康，家屋規模窄小、窗戶甚少，室內缺乏陽光照射，非常昏暗，如何改善家屋建築是一個最緊要的課題。²³到了明治36年（1903）已有時人用漢文說明家庭衛生的觀念：

夫衛生者，保衛生命、尊重生命也。……而不近病魔之法，是衛生之道也。……然而衛生之最可貴者，專在一身一家之清潔。故一身清潔，則病症不侵；一家清潔，則病毒不住……現據醫學者，所說之病源，大概因黴菌發生。其形狀甚小，以尋常眼力，不能視之。²⁴

說明其時開始具有黴菌（真菌）導致疾病的相關知識，身體與家庭衛生等觀念逐漸形成。

（三）大正時期的家屋清潔與家庭衛生

1920年代以降是臺灣進入「社會衛生」的時代，意指總督府有感於急性傳染病逐漸被控制，開始重視風土性和社會性等慢性疾病的防治。²⁵至於大正時期臺灣社會精英的居家環境整潔標準是否因此產生新的變化？我們從黃旺成在大正12-13年（1923-1924）於新竹客雅庄興建新家，透過家屋的建築工事，得以觀察社會精英對於家屋環境的規劃與考量；同時我們也透過黃旺成對於家屋清潔的記述，觀察當時民衆的家庭衛生觀念。

1. 居家環境

22 范燕秋，〈日本帝國發展下殖民地臺灣的人種衛生〉，頁167-169。

23 坪井次郎，〈臺灣の衛生〉，《臺灣協會會報》4號，1899/1/22，頁5-9。

24 〈論衛生之要〉，《臺灣協會會報》46號，1903/7/20，頁69。

25 范燕秋，〈日本帝國發展下殖民地臺灣的人種衛生〉，頁177。

臺灣傳統居住家屋以木造、竹造、土造三種方式築之，一般住民的家屋附近共用一口井水、沒有設立廁所，多半使用便器。屋內爲了避開夏季日照及冬季寒風，故少有天井，窗戶數量也較少、較小，因此採光及通風不良，屋內陰暗潮濕，居家環境衛生較爲不佳。²⁶黃旺成委託建築師傅火土司在竹塹客雅庄興建的家屋是新式的三合院式大厝。²⁷家屋正身是五開間的建築形式，²⁸屋宇的建材主要是以混凝土作爲石基的紅磚式傳統建築。家屋的外圍以木籬笆與竹籬笆圍繞，確定了私人空間與公共空間的分野；另外掘有深井以作爲清洗身體、衣物與居家環境之用。

進入家屋大廳內，入目即是神明圖像與公媽牌位，地上則是舖上地磚，地磚的使用在日常灑掃清潔上更爲便利。也可以觀見黃旺成購買玻璃櫥櫃等新式家具和時鐘，與朋友送的喬遷禮品——大掛鐘。黃旺成也自費請電線工人拉了兩根電線杆來接電，以接通電燈等用電設施，反映了居家生活日益的近代化。²⁹

在空間格局上，黃旺成更興建浴室與廁所等衛浴設施，廁所在當時仍然算是家屋少見的衛生設施。根據昭和初年殖民政府調查新竹市6,733戶家屋的廁所設置情形，其中有廁所的僅有513戶，另有1,046戶是共用廁所；換言之，新竹市設置廁所的家屋僅有7.62%。³⁰另外，黃旺成也在房屋周圍挖掘水溝以利排水，其客雅庄的新家確實符合了明治33年（1900）臺灣總督府頒布的「臺灣家屋建築規則施行細則」規範，有關家屋的構造與通風、清潔、採光、排水

26 李佳卉，〈日治時期臺灣「污物」處理之研究〉，頁57。

27 陳逢申，〈《黃旺成先生日記》序〉，收入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一）》，頁vi。

28 李乾朗，《臺灣古建筑圖解事典》（臺北：遠流，2003），頁65-66。

29 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一）》，頁2、6、8、10、14、18-26、34、45、95、120、164、224、228、300；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二）》（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3），頁86、102、146、158、187、214。

30 董宜秋，《帝國與便所：日治時期臺灣便所興建及污物處理》（臺北：臺灣古籍，2005），頁85-87。

等衛生理念。例如「臺灣家屋建築規則施行細則」第5條即是爲了因應臺灣的潮濕氣候，規定家屋下地盤至屋簷需爲12尺以上，家屋內居室的地板必須離地面有2尺，地板下得設置通風窗以流通空氣及掃除方便；第7條則是爲了改善臺灣傳統房屋光線的不足、室內陰暗難以除濕的居家環境，規定家屋居室的採光和通風面積應爲室內面積1/10以上。至明治40年（1907）時，爲了防範鼠疫，進一步強化家屋防鼠的構造與功能。³¹

必須留意的是，黃旺成興築了豬舍等家屋空間，維持傳統社會經營家庭副業的經濟考量，但也和清代豬隻與人類雜處一室的情形有所轉變。³²佐倉孫三在《臺風雜記》中提到領臺初期臺灣人愛吃豬肉，因此家家戶戶一定會畜養豬隻數頭，造成家屋居住環境「吸濁水、吃不潔，溺水狼藉，尿糞堆積，怪臭撲鼻」。³³然而，由於殖民統治初期，動物防疫著重在牛隻上，豬隻的重點在品種、飼料的改良，豬舍普遍通風與採光不良，約至大正初年以後才開始進行改良豬舍的獎勵措施，以改善疾病、排泄物製肥等問題。³⁴另一方面，黃旺成的家屋內也放養雞、鴨等家禽，雞蛋、鴨蛋可作爲日常食用，雞肉、鴨肉亦作爲藥膳滋補之用，飼養家禽也有做成招待賓客的佳餚，和貼補收入等用途。³⁵由於家禽仍然採用放養的方式，縱使黃旺成在居家生活中勤奮地清掃家禽的糞便，恐怕依然難以避免空氣中瀰漫的臭味與殘留的塵埃。³⁶

31 兒玉源太郎，〈臺灣家屋建築規則施行細則〉，《臺灣總督府報》829號，1900/9/30，頁80；佐久間左馬太，〈臺灣家屋建築規則施行細則改正〉，《臺灣總督府報》2243號，1907/7/30，頁74。

32 曾品滄，〈從田畦到餐桌：清代臺灣漢人的農業生產與食物消費〉（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6）；曾品滄，〈物競與人擇：荷治與明鄭時期臺灣的農業發展與環境改造〉，《國史館學術集刊》14期（2007.12，臺北），頁1-37；陳明達，〈日治時期臺中地區豬隻畜產改良之發展（1897-1945）〉（臺北：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頁1-2、9-13。

33 佐倉孫三，《臺風雜記》，頁36。

34 陳明達，〈日治時期臺中地區豬隻畜產改良之發展（1897-1945）〉，頁33、46。

35 有關藥補食用可見1912年12月24日、1914年11月10日與12月19日之記載：「在家裡殺了一隻公鴨當作晚餐」、「錢仔、寶仔吃補藥雞」、「歸村。辛庚補藥雄雞2.6斤，祖父風藥雞母2.6斤」；招待賓客之記載可見1919年6月10日：「買麥酒、殺雞，請出張官吏，予為代主人」。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三）》（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9）、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七）》。

36 渡邊七治，〈塵芥漫談〉，《臺灣公眾醫事雜誌》3卷6號（1930.6，臺北），頁17-19。

就此而論，黃旺成的客雅庄新式宅第實為一新舊文化雜揉的居家環境，家屋設計規劃是企圖維繫傳統農村畜牧副業經濟模式，增加家庭經濟收入，同時也逐漸融合了近代化家庭衛生所需的基礎設施。

2. 家屋清潔

大正時期以前新竹街莊的道路以泥砂與石頭路面為主（圖1），遇到雨天時，道路就會變得泥濘難以行走。³⁷在黃旺成日記中也可觀見新竹風勢較大，不時就有「飛砂走石」的境況，因此時常需要人手灑掃家屋內外，避免居家生



圖1 日治初期竹塹街的街道景象

資料來源：張建隆，《看見老臺灣·續篇》（臺北：玉山社，2004），頁24。原圖出自臺灣總督府民政部編，《記念臺灣寫真帖》（臺北：臺灣總督府民政部，1915），無頁碼。

37 1912年1月31日：「回家途中，還好雨不下了，但是道路還是像早上一樣很難走。」1912年3月16日：「到東門外的官設道路換了足袋，途中的路況不好，非常難走，真是筆墨難以形容。」1921年2月10日：「車已去，滿路泥濘。」3月31日：「黑暗路泥濘，靴盡污。」5月25日：「雨靡靡，路泥濘，草鞋及襪盡濕。」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一）》，頁54-55、142-143；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八）》（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2），頁62、116、178。

活環境沙石灰塵過多。³⁸在黃旺成的生活世界裡，我們很容易就能發現當時居家清潔打掃工作需要頻繁且規律地清掃，才能維持比較舒適的生活環境，因此從事居家清潔工作的成員頗為多元。

首先，為商號中雇用的傭人、雇工與店裡夥計等傭工進行清掃工作。黃旺成家經營的陵豐商號內雇用的工人葉廣等人偶爾會來家中幫忙掃除工作，³⁹大正6年（1917）4月，黃旺成的父親與三弟陳辛庚（1895-1921）在清掃繼母鄭氏匏萼（1888-？）的新房時，也有記述家裡雇請的傭人張桂有來幫忙打掃。⁴⁰大正8年（1919）黃旺成開始經營新創辦的元豐商行，也雇用工人與夥計劉金獅、林添壽（？-1924）等人洗掃店內、店口等處，自己也光著腳幫忙洗掃店內樓上、樓下的總舖、窗戶等處。⁴¹大正15年（1926）黃旺成創辦紡織工場時也提及：「家中大清潔施行的日，早上使一個男工並兩、三個女工回去幫忙。」⁴²商店的環境衛生主要是由雇請夥計、工人和傭人等人進行整頓打掃的工作。

其二，為家庭成員進行日常的打掃。像是黃旺成提到母親黃氏偷（1871-1913）在家中會打掃豬糞、扒挖田螺等清掃事務。⁴³或是黃旺成的三弟陳辛庚幫忙家裡整頓室內環境，⁴⁴陳辛庚的妻子侯氏寶（1898-？）被要求要打掃家

38 1914年5月15日：「北風吹沙急，座上塵埃積。」1916年4月6日：「三時半退校，歸家掃除，塵埃萬丈，至六時方好。」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一）》，頁312-313；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三）》，頁146；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五）》，頁64。

39 1919年1月24日：「午後家內舊年末大掃除。葉廣歸，相幫拭玻璃；余亦歸，拭房內兩小玻璃。」1919年1月27日：「晚與廣共收拾一室。」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七）》，頁20、22。

40 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六）》，頁74。

41 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七）》，頁156、159、178、181、182、186、192、200、212、232、240、284。

42 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三）》，頁354。

43 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一）》，頁379-390、559。

44 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五）》，頁56。

中的內外。⁴⁵黃旺成的妻子林玉盞（1889-1963），在日常生活中忙碌於照顧孩子、煮飯、裁縫衣褲等家事。⁴⁶日記中常見到林玉盞吃完早飯後，去井邊洗濯很多衣物，或前往客雅溪畔清洗被套，維持家人服飾與寢具的潔淨與舒爽。⁴⁷黃旺成基本上認為打掃家宅廳房是屬於婦女份內的工作事務，⁴⁸而非自己必須經常處理的事務，⁴⁹因此記載：「下午一邊讀《元明清史略》，一邊監督妻子整頓房間。」⁵⁰

再次，黃旺成自身也時有居家清掃之舉。他常會提到「打掃好像豬圈一樣的屋子內外，出現一條乾淨的小路，心裡稍微安穩」等等令其身心舒爽暢快地描述。⁵¹黃旺成以星期日在家裡打掃的次數最頻繁，時間有時長達數小時之久，⁵²並詳細記錄了清掃的事項。其中包括打掃書齋或廳房的桌椅茶几、清洗走廊、竹蓆，或是幫忙曬棉被、鋪蓋和衣服，甚至也有掃除深井上下、整頓大

45 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一）》，頁49-50。

46 1915年1月17日（日）：「上午妻子忙於洗濯、煮飯等事，午飯在下午一點過後才吃到。」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四）》，頁25；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三）》，頁194-195；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三）》，頁56。

47 另外，如黃旺成的文官制服等貴重衣物則會拿去「西洋洗」，即送至洗衣店以西洋洗濯方式清洗。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六）》，頁86。有關西洋洗參見陳柔縉，《赫事臺灣》（臺北：東觀國際文化，2007），頁194-201。

48 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八）》，頁242；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一）》，頁48。

49 1915年8月7日：「六時起床，朝食後依舊抱繼圖下樓，待內子掃室畢方登樓。」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四）》，頁194。

50 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一）》，頁6-7。

51 1912年4月14日：「早餐後，好好整頓掃除一下深井。」1919年2月17日：「午前在家掃室，整頓大廚。」1919年2月19日：「予一時半到家，掃室、淨几。」1919年2月21日：「無聊可歸，洗掃室內畢方朝食。」「小清潔，整頓冬夏服各入皮箱、洗掃大櫥及棹櫃，內中所置之物品皆變更。自午前十時起，至午後四時方得大略整齊。然後掃室、拂几，洗身，晚餐。」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一）》，頁186-187；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七）》，頁41、42、44、102、104；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八）》，頁395。

52 如1912年2月4日（日）：「今早和平常一樣起床、洗掃，心情很清爽」、1915年7月25日（日）：「朝事畢，精密洒掃廳房，至十時餘方濟」。「下水溝（樓下）污穢異常，雖勞働者亦不肯為，而予為之至於清潔，爽快異常」。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一）》，頁63-64；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四）》，頁185；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六）》，頁50；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九）》，頁50。

櫥及櫃子、焚燒塵堆等等清潔行爲。⁵³又如黃旺成家中成員在換季時，會將衣物或是碗皿在日光下曝曬。⁵⁴這些家屋清潔行爲一方面是傳統《朱子家訓》所云：「黎明即起，灑掃庭除，要內外整潔」，⁵⁵是傳統士人倡言的一種品德表現；另一方面，也受到近代西化衛生教育的影響，通過曝曬、清洗、焚燒等方式，改善居家的衛生，防治病媒的傳播。

3.家屋消毒

我們還可以從黃旺成清潔家屋的過程中，觀見「消毒」的觀念開始確立，例如黃旺成的三弟陳辛庚在大正10年（1921）肺病過世時，提及：「出葬後室內各處予親用石炭酸（按：苯酚、羥基苯，具毒性的殺菌劑）及灰粉消毒，晚使三弟婦以滾水煮遺物。」⁵⁶石炭消毒、滾水煮物已成為特殊情境下的重要清潔方式，顯示近代衛生觀念逐漸固著於社會精英的認知體系。

上述各種發生在黃旺成住家的掃除清洗情形，已漸漸不同於傳統德行上的整潔方式，住家衛生設施與空間規劃發生轉變，一般清潔方式包括日光曝曬、焚燒塵埃、清洗擦拭等。若是家中有病患時，尙且會增加滾水煮物，以及利用化學原料如石炭酸、石灰粉進行消毒殺菌的加強工作，說明大正時期臺灣的社會精英已萌發近代家庭衛生的觀念。

三、家庭衛生觀念的轉變

從日記中可以歸納出大正時期臺灣民衆家庭衛生觀念的轉變，主要仰賴於公學校的養成教育、社會網絡的傳遞與散播，以及衛生展覽會的推廣。

53 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一）》，頁300。

54 黃旺成在母親過世後，除將廳房進行清掃外，也是將母親的衣服以日光消毒。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二）》（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8），頁266-267、367。

55 朱用純，《朱子家訓白話註解》（上海：明善書局，1933），頁1。

56 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八）》，頁270；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三）》，頁279。

（一）公學校的養成教育

公學校的修身科教育內涵除了重視國民精神之涵養、順從、誠實與勤勞等，同時也強調衛生清潔的實踐，總督府藉由公學校教育的管道，將居家環境衛生知識滲入民衆日常生活。黃旺成作為公學校的訓導，在修身等課程中教導學生有關傳染病的故事以及各種衛生知識，⁵⁷實際進行清掃工作時，也會教導他們利用日光還有昇汞水（按：氯化汞，一種含有劇毒性的殺菌劑）進行書籍、椅子、桌子等器物之消毒工作。⁵⁸

公學校的掃除工作可以分為平日的例行性打掃，還有每學期初與學期末的大掃除，透過固定時間進行規律清掃，培養學生具有清潔打掃的習慣。⁵⁹另外，若是遇到長官要來巡察學校，甚至會讓部分學生停止上課專心清掃，以及額外雇用工人來學校打掃。日記中大正4年（1915）5月6日便記載：

因明日長官要來本校，故本日校中五年以上全無授業，皆分擔區域掃除……尚雇有許多人工來校掃除……午後授業後，各級皆大掃除，余級雖一年，而掃除亦甚周至。⁶⁰

黃旺成也會觀察新入學生是否擅長學習打掃工作，對學生分配各自的指定打掃區域，並進行監督打掃等行爲，可以觀見公學校教育對於臺灣人清潔習慣

57 1912年7月9日：「和平常一樣到學校。第一節是修身，講了一個關於傳染病的故事。」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一）》，頁321-322。

58 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一）》，頁426-427。

59 1917年2月6日，上元節：「午後各教室大掃除。」6月30日：「八時起在講堂終業式，大掃除。」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六）》，頁28、32、60、123。

60 可見另一例在1915年3月26日：「見阿、上、安三人率苦力拚掃教室。」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四）》，頁98、128。

的養成，以及確立個人擔負清潔空間的觀念，是形塑近代化家庭衛生環境的重要途徑。⁶¹

另外，公學校講堂有時也會舉辦衛生講座，邀請醫療專業人士前往宣導公眾衛生知識。黃旺成擔任公學校老師時，在星期日也參與了這類的衛生醫療演講活動，例如在大正4年（1915）2月14日有記載：「吃了午餐後出門，到學校講堂聽中川院長談發現寄生蟲中間宿主的話。」⁶²因而得以進修學習新穎的衛生保健知識，並再教導給公學校的學生。

（二）社會網絡的傳遞與散播

公眾衛生知識與清潔習慣除了透過公學校的教育養成外，⁶³在日記中甚至可以看到「衛生」成爲一種話題，開啓了對於衛生知識的傳遞與流通的社會網絡。例如黃旺成至臺中蔡蓮舫家擔任長子蔡伯淙（1915-1954）的家庭教師時，就曾記錄與蔡蓮舫一同前往安田醫院受診，並在醫院內和醫師安田稻實（1874-？）談論衛生、經濟等話題數十分鐘，黃旺成等人或許也因而吸收或修正了公眾衛生知識。⁶⁴

其次，黃旺成與心心醫館西醫張順臣（按：張忠，1883-1947）熟識，張順臣如同黃家的家庭醫師，提供不少醫療衛生知識。張順臣也爲黃旺成「計劃

61 1912年4月2日：「每位老師以上年度擔任的班來分班，叫學生整頓、打掃教室。我叫許氏冠英、鄭氏珠、黃氏順三位女學生來做，她們比平常活潑地工作，所以我心情大為爽快。」1912年4月13日：「下午再去學校，監督高年級學生，叫他們打掃學校周邊。」1915年3月9日：「下午第一節課讓一部份的學生分擔打掃指定區域，一部份的學生打掃教室。因為民政長官夫人搭乘五點過後的火車抵達新竹，所以全部的女學生都前往迎接，職員自願。」1915年4月13日：「監督掃除，新入生有三、四人巧甚。」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一）》，頁168-169、184-185；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四）》，頁87、112-113。

62 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四）》，頁63。

63 張秀蓉編，《日治臺灣醫療公衛50年》（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社，2012）。

64 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九）》，頁266。

將來家庭衛生改良事」，由此而討論數小時之久。⁶⁵黃旺成顯然會受到和張順臣衛生談話的影響，在隔日就向妻子林玉盞說：「黴菌實為病之媒，衛生思想要發達」等語，又在夜晚時向妻子殷殷勸告，希望此後食器用具要留意小心，注意清潔衛生。⁶⁶我們從日記中還可觀見黃旺成記述：「晚上與母親講盤吸蟲（按：即肺吸蟲）和肺結核的事情。」⁶⁷黃旺成使用「肺結核」西式醫學用語而非「肺癆」傳統漢醫詞語，顯示已然認知「肺結核」與結核桿菌相關且具有傳染性，而不再是傳統「肺癆」的虛弱過勞成疾。⁶⁸上述諸例映射出新式醫療衛生觀念與宣導預防知識，在家庭內部中傳遞與散播的歷史情境。

（三）衛生展覽會的推廣

大正4年（1915）4月1-5日新竹廳舉辦了一場衛生展覽會。⁶⁹展覽會為了吸引大眾參展，特別募款請日本飛行員來表演，同時在南門開矢野巡迴動物園，新竹座舉行各式表演等娛樂活動；另一方面，尚且有在北郭園舉辦新竹書畫展覽會等藝文活動，以及在市內各商店開辦拍賣、抽獎等商業活動。⁷⁰在展覽會期間，新竹公學校作為會場之一，在講堂內也召開衛生演講與衛生幻燈會，並派駐閩南語與客家話的翻譯人員；⁷¹黃旺成也曾擔任翻譯人員的角色，將幻燈會所展現的衛生新知翻譯給參觀展覽的民眾聆聽。⁷²

65 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八）》，頁260。

66 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八）》，頁260。

67 盤吸蟲拉丁學名為schistosomes，日語為チストマ。引自：金森辰次郎，〈一新寄生虫卵二就テ〉，《中外醫本新報》，627號，1906，頁640；田邊操，〈人體寄生虫病診療の實際〉（東京：南山堂，1944），頁78-80。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一）》，頁246-247。

68 張淑卿，〈防癆體系與監控技術：臺灣結核病史研究（1945-1970s）〉（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4），頁28-31。

69 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四）》，頁89-90。

70 〈展覽會と新竹〉，《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15/3/25，7版；〈衛生展覽會〉，《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15/4/1，7版；〈衛生展覽會閉會〉，《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15/4/7，7版。

71 〈熱鬧中之新竹〉，《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15/4/2，6版。

72 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四）》，頁105-106。

這次的衛生展覽會可以從日記中見到黃旺成任職的公學校校長阿部光平（1882-？）、教諭上原宗五郎（1885-？）以及安山圭三（1883-？）等人，在3月13日便開始協助衛生展覽會的籌辦活動，並且規定展覽會期間職員必須一同負責會場的行政事務，⁷³黃旺成則是在4月2-3日被分派到看管會場入口之職務，⁷⁴會展期間也和好友張式毅（1890-1977）等人前往參觀展覽會。⁷⁵日記中還提到這次衛生專題演講是由高木友枝（1858-1943）及稻垣長次郎（1874-1944）博士主講，引介了衛生新學說與新知識。⁷⁶

大正10年（1921）在臺中工作的黃旺成，也提到該年度臺中衛生展覽會的展覽概況。這次展覽是由臺中醫師會所主辦，會期為10月9-18日，開放時間為早上8點到晚上10點，會場設在樂舞臺，餘興場則是在臺中公會堂舉行。展覽會的門票大人二十錢，小、公學校學生通通免費。⁷⁷因此黃旺成提到會場附近「熱鬧非常」，⁷⁸《水竹居主人日記》也提到這次的衛生展覽會：「數日來派臺中州管內街庄各戶人民並各學校生徒往玩，人千人萬，市街幾為之滿焉。」⁷⁹不過，黃旺成連續參觀衛生展覽會兩天的感想是：「亦覺平凡，特別會陳列男女模型，局部畢露，示花柳病也。」⁸⁰由此看來衛生展覽會確實如官方所云人氣相當的高，但是從社會精英參觀後的感受而論，似乎不一定和展場人氣相符合。同樣的例子不難在日記中察覺，像是大正13年（1924）黃旺成

73 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四）》，頁101。

74 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四）》，頁104、105-106。

75 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四）》，頁106。

76 劉士永，〈「清潔」、「衛生」與「保健」：日治時期臺灣社會公眾衛生觀念之轉變〉，《臺灣史研究》8卷1期（2001.10，臺北），頁41-88。

77 〈臺中の衛展 九日から十日間〉，《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21/10/4，7版。

78 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八）》，頁312-314。

79 詳見1921年10月14日之記載。張麗俊，《水竹居主人日記（五）》（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頁423。

80 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八）》，頁316。

也提到：「全大張往第一公學校觀衛生展覽會，無甚可觀者。」⁸¹同樣透露了1920年代衛生展覽會的展示內容，可能沒有獲得當時知識份子的喜愛。

大正10年（1921）新竹也有新竹展覽會，會期為10月28-31日，分為勸業、蕃產、教育、衛生、運動、餘興等各部展覽會，但衛生、勸業二館延期到11月2日才閉館，據估計各館入場者約10萬人以上。⁸²黃旺成與鄭元璧（1891-？）兩家人一同前往觀看，「各會場人積如山，不能進入，乃往最閒散之女子公學之生花、骨董陳列場……遇式穀、榜先，一全參觀教育展覽，再至公會堂看勸業展覽、生蕃展及衛生所，人多不得入，回家將五時矣。」⁸³透露出展場人氣的鼎沸，反而讓部分大眾無法有餘裕悠閒與吸取展覽會宣導的衛生新觀念。

人潮壅塞妨礙大眾參觀的情形似乎並不罕見，黃旺成也提到大正11年（1922）臺中市役所為了涵養本島人的衛生思想，選定在12月15-17日於臺中座舉行免費的衛生活動照片展覽。⁸⁴黃旺成在晚上與蔡蓮舫家傭人鄭連成、人力車伕阿臨前往觀覽，但因「業已滿員，乃散步各處景品抽籤場歸」。⁸⁵大正15年（1926）12月時，新竹舉辦了新竹共進會，第二會場的新竹第一公學校也有設置衛生館，黃旺成和友人前往參觀，看展時「走馬看真珠」，看來也是倉促瀏覽，收穫有限。⁸⁶

81 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一）》，頁225。

82 〈新竹兩展覽會〉，《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21/10/26，5版；〈愈愈本日から開會の新竹展覽會〉，《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21/10/28，7版；〈新竹の招魂祭と展覽會閉館式〉，《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21/10/30，2版；〈新竹展覽會 二館を延期して閉館 觀覽者數十萬餘〉，《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21/11/2，2版。

83 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八）》，頁333-334。

84 〈衛生活寫〉，《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22/12/16，4版。

85 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九）》，頁418。

86 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三）》，頁412-413。

就此而論，衛生展覽會通過在特定的展場空間及時間內展示過程，的確將抽象的衛生概念轉化為實體「視覺化」的衛生產品，以達成主辦者所預期的目標。⁸⁷但是也必須留意衛生展覽會熱鬧非凡的背後，社會大眾對於衛生知識的獲得，可能仍有其局限性。

綜合而言，大正時期居家環境衛生知識的確立，也可以從黃旺成對外部環境衛生的觀感進行考察。黃旺成記述有一天早晨看到日本人松本安藏（1870-？）在臺中市清潔街道時的感覺：「朝起較早，見松本辯護士沿街掃除，甚感心焉。」⁸⁸可見日本人從居家清潔擴大至自主自發地進行市街環境打掃的行為，對當時的黃旺成而言產生一定程度的情感共鳴。不僅於此，黃旺成外出到位於新竹東門的他力堂喫茶店晚餐時，對於喫茶店的室內衛生環境也有所評論：「食料雖平常，而室中設備整潔，可謂文化食堂。」⁸⁹室內環境的整潔更被認為是一種文化的展現。這種環境衛生觀念的建立影響深遠，因此黃旺成大正8年（1919）與朋友前往中國福州旅行時就感嘆：「隨元璧訪楊文炳，出行各小街，污穢難堪。」⁹⁰對於福州城南臺小街巷的市街環境不甚滿意，透露出當時臺灣市街的環境衛生水準可能已超越福建省會的福州。至於臺灣一般民眾為何開始試圖改善市街和家屋的衛生狀況，原因之一即是殖民政府開始推動春秋季大清潔日的措施。

四、春、秋季大清潔日的推動

近代國家對於公眾衛生的重視，主要是受到急性傳染病流行問題而產

87 范燕秋，〈「衛生」看得見：1910年代臺灣的衛生展覽會〉，《科技、醫療與社會》7期（2008.10，臺北），頁65-128。

88 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九）》，頁110。

89 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三）》，頁170。

90 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七）》，頁63。

生，⁹¹殖民地臺灣同樣也是殖民母國爲了防治殖民地傳染病的蔓延，因而迅速訂定相關的衛生防疫政策與法規。由於明治29年（1896）臺北、臺南兩街市發生大規模的鼠疫，總督府爲了防止疫病的擴散，重視傳染病與風土病的控制，總督府更通令地方官廳施行消毒清潔或臨時大清潔，因而逐漸成爲年度例行事務。⁹²到了明治33年（1900）總督府開始實施改善市街環境衛生爲目的之「污物掃除法」等環境衛生法令，也在明治38年（1905）正式公布「大清潔法施行規程」，⁹³規定由地方廳長每年春、秋兩季公布大清潔施行日期、地點及施行重點，市街與居家環境衛生正式進入法制化、規範化的時代。

殖民政府主要是通過日本警吏從上層進行領導，結合庄長、保甲組織成員到各家戶徹底檢查，⁹⁴將衛生政策向下直達至地方社會，從而改變臺灣大眾的居家生活環境與日常生活作息（圖2、圖3）。從《黃旺成先生日記》中不僅能夠觀察大清潔法的實際運作細節，不論是日本人或臺灣人皆會鄭重其事地進行打掃，⁹⁵同時也可以清楚感受到春、秋兩季大清潔深刻影響了臺灣人的日常生活作息。

91 小野芳朗，《「清潔」の近代：「衛生唱歌」から「抗菌グッズ」へ》（東京：講談社，1997），頁102。

92 范燕秋，〈從臺灣總督府檔案看日治時期的公眾衛生〉，收於國史館編著，《臺灣史料的蒐集與運用討論會論文集》（臺北：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2000），頁151-196；范燕秋，〈由《水竹居主人日記》看殖民地公眾衛生之運作〉，收入范燕秋著，《疫病、醫學與殖民近代性》，頁160。

93 兒玉源太郎，〈大清潔法施行規程〉，《臺灣總督府報》1870號，1905/11/28，頁47。

94 范燕秋，〈由《水竹居主人日記》看殖民地公眾衛生之運作〉，收入范燕秋著，《疫病、醫學與殖民近代性》，頁152。

95 例如1915年4月25日：「上原等本日宿舍大清潔。」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四）》，頁120。



圖2 家屋大清潔前



圖3 家屋大清潔後

資料來源（圖2～圖3）：臺中警務部衛生課，《保健組合事業概況書》（臺中：臺中衛生課，1939）。

新竹地區大清潔施行日又稱為「新竹衛生デー（按：日）」，⁹⁶在衛生日開始的前幾天，黃旺成家裡已經先行清掃部分住屋空間。⁹⁷家中的成員如林玉盞、黃旺成、三弟陳辛庚與繼母等人都會共同清掃居家環境，如洗潔大廳及清理深井等事務。儘管幫忙清掃的人手不少，所需勞動時間常常仍是要從早上到傍晚持續進行。⁹⁸

春秋季大清潔日具體的清掃內容，可以看到黃旺成在店家和店裡的夥計林添壽等人一同汲水灑掃；⁹⁹在住家則是忙碌於包括拆撤蚊帳與搬運箱籠、清潔床鋪，冬夏衣裳也會拿出至磚棚進行曝曬，或以精油洗帽子、掃除玻璃窗等等。等待大清潔檢點完畢後再將其復歸原位，大概是晚上6點了，例如大正10年（1921）3月20日記載了臺中春季大清潔法施行下的清掃狀況：「本日大

96 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一）》，頁298。

97 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五）》，頁172。

98 1916年9月27日：「三時半退校，因明日為大清潔之期，退校後即從事掃除，三弟亦來相掃巷路，晚飯後又大掃除，至九時方休息，計勞働約五時間，甚勞頓，洗手足畢已將十時。」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五）》，頁172；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一）》，頁298。

99 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七）》，頁215-216。

清潔法施行……乃將冬服全部收置皮箱，至晚方閒，而體力疲矣。」¹⁰⁰另外，每年兩次的衛生日有時會因為受到大風雨阻礙，因此展期至天氣清和時再舉行，¹⁰¹如黃旺成提到：「朝起後從事洗掃庭除，及後乃知本日施行清潔法，因近午雨至，日光消毒之分遂移他日。」¹⁰²

負責春秋兩季大清潔的檢查人員是由地方上的巡查、巡查補以及保正等人共同進行稽查，¹⁰³實際執行上有時巡查會來家裡檢查兩次以上，¹⁰⁴甚為謹慎嚴密。大正2年（1913）4月9日黃旺成不悅地寫到：

村家、店都施行大掃除。聽妻子說今天負責檢查我家清潔的警官罵我家不夠乾淨，他叫祖父明天到派出所報到，這件事情讓我非常惡感，一個晚上話說不出來。¹⁰⁵

顯然在當時若是未能達到警官認定的居家清潔程度，會遭到嚴厲訓斥，並且家中戶長還必須前往派出所報到。我們從日記中也不難察覺因為大清潔法的施行與稽查，造成地方群眾與警察人員種種嫌隙的產生。例如大正3年（1914）4月17日提及：「村家大掃除，擔當的巡查非常無禮。」負責的基層警員可能對地方群眾在言語和態度上是相當的無禮與權威。¹⁰⁶又或是像大正5年（1916）時說：「朝，警務課召喚狀，召父親、二弟往，甚關切。後知為巡

100 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八）》，頁106；另外例子參見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五）》，頁67、172-173。

101 〈清潔展期〉，《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24/4/13，6版。

102 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一）》，頁120。

103 1912年4月24日：「在店裡，進行大掃除，警察也沒有發什麼牢騷。」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一）》，頁200-202。

104 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十）》，頁357。

105 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二）》，頁129-130。

106 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三）》，頁114-115。

查補吳進成告發掃除事，被罰三角。」¹⁰⁷顯示執行稽查大清潔的巡查補可以向上級稟報，懲罰環境不潔的家庭。¹⁰⁸黃旺成也曾記載朋友張傑（1888-？）的煙館有監督清潔的轄區警員坐很久，令人感到厭煩，張傑最後是招待警員吃餅，警員才肯離去，側面反映了當時部分警察有著執法濫權的情況。¹⁰⁹

大清潔日的檢查可能也根據不同原因，並非每次都是確實地進行檢驗，黃旺成記述：「內子洗掃將畢，余方起少助而洗床又就褥……午後一少相識之巡查補來，無甚檢看即言收之。」¹¹⁰也有一年的大清潔日，家裡認真進行大掃除，忙碌一整天後，巡查補只是隨便地檢查後就離開，令黃旺成感到不快。¹¹¹

最後，我們可以看到黃旺成也記錄其他人遇到大清潔時生活作息的改變，例如大正8年（1919）鄭元璧因為在家清潔，所以上午沒有來元豐商行，至下午1時方來；¹¹²大正15年（1926）則是記述：「女工彩卿獨自出場，冷冷清清地做了一天的工，我很感心。問他的理由，說是再幾天要大清潔須欠勤」，¹¹³顯示大清潔對日常生活作息的影響。黃旺成也曾提及原本想要前往拜訪老師

107 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五）》，頁85。本年2月1日記載：「九時頃一吳巡查補與買褲人來，無禮甚，余怒與之口角，後悔無大搶白之。」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五）》，頁21；4月24日記載：「第四時限唱歌，將畢時桂仔來，言昨與吳巡查補口角，本日出召單，桂往使不得，今父親已往，余甚惶惶，匆匆授業畢，即歸，父親已還，言通譯朝山君甚優待，無事歸，方安心。」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五）》，頁76-77。

108 臺灣總督府有感於巡查人數不足，但志願來臺的日籍巡查甚少，因此在明治32年（1899）創設「巡查補」制度，以臺灣人為招募對象，經過身體檢查及學科測驗，執行警備工作。明治44年（1911）又規定績優巡查補可以報請晉升為巡查。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5卷（東京：綠蔭書房，1986），頁301-302。

109 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一）》，頁120。

110 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四）》，頁121。

111 1916年10月5日：「早上起來馬上做內外掃除整頓，吃完早餐後把衣服拿出來做日光消毒，巡查來到這裡，但連聲招呼都沒有打，他只是發出沒有什麼意義的命令就離開。將經過日光消毒後的衣服收起來，很疲倦。」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三）》（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9），頁285-286。

112 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七）》，頁216。

113 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三）》，頁348。

張麟書（1856-1933）先生時，看到他們家正在施行大清潔，所以不拜會而轉往他處。¹¹⁴或是與蔡伯汾（1895-1984）一同去拜訪彰化銀行任職的岩瀨啓造（1876-1942），也同樣提到「適其宅大清潔法，旋即辭退」。¹¹⁵由此而論，春、秋兩季大清潔日之環境衛生政策，深刻地影響了臺灣民衆的日常生活作息。

五、蚊蟲與家庭衛生

大正時期，臺灣居家環境衛生觀念與家屋清潔習慣正處於逐漸養成的時期，日常生活中仍有各類疾病有待防治與處理。本節從黃旺成家屋環境記述病媒蚊、寄生蟲等病源媒介，致使人們頻繁罹患瘧疾、天狗熱（按：デング熱，即登革熱）與寄生蟲病等情形進行考察，呈現大正時期臺灣居家環境衛生與居家生活之樣貌。

（一）瘧疾與天狗熱

在夜晚生活中黃旺成最感到困擾的問題便是蚊子的肆虐。日記中長期描述黃旺成受到蚊子侵擾的窘況：「昨晚半夜，很兇惡的蚊子進到房間裡來，為撲滅牠花了一小時。」「夜大為蚊軍所困。」「方將入夢，復被蚊軍所襲。」¹¹⁶一般家庭除了使用蚊帳或蚊罩外，大都是購買驅蚊油以驅除蝨、蚤、蚊、蚋等害蟲。¹¹⁷

114 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九）》，頁334。

115 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一）》，頁142。

116 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一）》，頁281-282；另可見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五）》，頁168；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八）》，頁161；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十）》，頁181。

117 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八）》，頁276。

在20世紀初期殖民政府開始將有關瘧疾方面的細菌學等新知引入臺灣。¹¹⁸然而，由於當時帶有瘧原蟲的病媒蚊數量很多，一般民衆罹患瘧疾的機率仍然相當高。例如大正4年（1915）11月除了林玉盞得到瘧疾，二子黃繼志（1914-？）也得到瘧疾；¹¹⁹到了12月，黃旺成也感染瘧疾，發燒至39度。¹²⁰隔年妻子林玉盞發熱、惡寒，又再次確診為瘧疾。這次生病的期間甚長，從6月23日發病以後，雖有服用各類抗瘧疾藥丸，然而狀況時好時壞，復發數次，嘔吐呻吟。至9月22日，仍然看到黃旺成買公雛雞等物給妻子滋補身體，以治療瘧疾的記載。¹²¹同年11月公學校的李良弼（1889-1944）也因瘧疾而早退。¹²²大正11年黃旺成的朋友沈梅岩（1892-1969）因為未婚妻感染惡瘧，原定的結婚式遂改期舉行。¹²³瘧疾等風土病誠如劉士永所言，在1920年代以後才逐步獲得某種程度的控制，從十大死亡原因排名穩定下降，直至昭和16年（1941）才降至十大死因第十位。¹²⁴

除了瘧疾以外，黃旺成家庭成員也由於病媒蚊而染上了天狗熱。例如大正11年（1922）11月黃旺成長子黃繼圖（1912-1974）罹患天狗熱，接下來約一星期頭痛、腹痛不止等激痛，兼有嘔吐、元氣衰弱等症狀。¹²⁵

（二）寄生蟲病

寄生蟲病是日本時代臺灣很常見的疾病，亦是觀察居家環境變遷的有效指

118 范燕秋，〈日本帝國發展下殖民地臺灣的人種衛生〉，頁167-169。

119 「晝繼志手足皆冷，元氣全無，惶惶失措，及順臣兄來，方知為瘧疾發寒。」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四）》，頁258、260。

120 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四）》，頁268。

121 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五）》，頁112-115、126-128、134、169。

122 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五）》，頁202。

123 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九）》，頁251。

124 劉士永，〈日治時期臺灣地區的疾病結構演變〉，《新史學》13卷4期（2002.12，臺北），頁165-208。

125 參見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九）》在1922年11月18-25日等記載。

標。¹²⁶臺灣總督府雖然早在明治42年（1909）就公布農村地區的公學校要特別注意學童的感染和除蟲等通知。但是，我們在黃旺成的日記中仍然普遍觀見腸道寄生蟲病的橫行，其中尤以幼兒得到蟯蟲疾病的記載最多。例如大正2年（1913）12月黃繼圖吃完晚餐後，從嘴巴吐出一條蟯蟲，黃旺成就到駱萬得（1888-1953）處買了蟯蟲藥五錢給繼圖服用。¹²⁷上野齊就以爲臺灣人有在哺乳期給幼孩胡亂提供飲食的陋習，故幼兒幾乎都有寄生蟲方面的疾病。¹²⁸

其次，蛔蟲病感染率亦甚高。由於當時臺灣以糞便爲農作物肥料，農作物卻未能徹底清洗乾淨再食用，造成幼童感染蛔蟲病的情形一再發生。例如大正3年（1914）記載黃繼圖肚子痛，得了蛔蟲病，因此糞便中有「文蟲二、三尾」。¹²⁹大正10年（1921）6月，三子黃繼舜（1915-1937）則是被診斷爲「斷爲百日嗽兼有蛔蟲，下午大哭腹痛」，繼母爲黃繼舜抹如意油，以消解孩童的腹痛。¹³⁰和蟯蟲病相同，蛔蟲病同樣展現了大正時期飲食衛生未能完備的家庭生活景況。

張素玢指出自1920年代以後，由於殖民政府對學童展開驅蟲措施，投入大量的驅蟲藥，才使得學童們的驅蟲有了較佳的成效。¹³¹我們從大正11年（1922）新竹郡臺灣學童寄生蟲卵帶有者之統計數據而論（表1），0-15歲的新竹學童寄生蟲卵感染率約爲82.65%。¹³²再從1930年代初期新竹州對當地民

126 劉翠溶、劉士永、顧雅文，〈以寄生蟲病做爲二十世紀臺灣環境變遷的一項指標：初步探討〉，收入劉翠溶主編，《自然與人爲互動：環境史研究的視角》（臺北：聯經，2008），頁523-590；劉士永，〈從血絲蟲到瘧原蟲：從風土病類型轉移看臺灣西部平原之開發〉，收入王利華編，《中國歷史上的環境與衛生》（北京：三聯書店，2007），頁393-423。

127 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二）》，頁436、442。

128 上野齊，《普通衛生講話》（臺中：池ヶ谷榮吉商店，1923），頁150-152。

129 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三）》，頁215-216。

130 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八）》，頁216。

131 張素玢，〈蟲蟲戰爭：海人草與臺灣寄生蟲防治（1921-1945）〉，收入范燕秋主編，《多元鑲嵌與創造轉化：臺灣公眾衛生百年史》（臺北：遠流，2011），頁129-176。

132 新竹州編，《新竹州保健衛生調查書綜合表》（新竹：新竹州衛生課，1934），頁89-93。

眾糞便進行寄生蟲卵的調查而論，該次實際檢查人數為男性3,144人、女性2,843人，總計有5,987人受檢。其中寄生蟲卵保有者男性2,908人、女性2,673人，總計5,601人，成人的寄生蟲感染率高達93.55%，顯示驅蟲成效甚微，並主要作用於校園之內。¹³³

表1 大正11年（1922）新竹郡臺灣人寄生蟲卵帶有意者統計表

年齡	無感染者	感染者	合計	感染率
0-1	256	275	531	51.79%
1-2	111	511	622	82.15%
2-3	85	484	569	85.06%
3-4	88	503	591	85.11%
4-5	103	523	626	83.55%
5-10	398	2,339	2,737	85.46%
10-15	404	2,249	2,653	84.77%
合計	1,445	6,884	8,329	82.65%

資料來源：新竹州編，《新竹州保健衛生調查書綜合表》（新竹：新竹州衛生課，1934），頁89-93。

六、結語

本文透過審視《黃旺成先生日記》中所見的家屋清潔生活、家庭衛生環境，一方面說明臺灣總督府透過公學校教育、衛生展覽會對臺灣人家庭衛生觀念的養成，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衛生知識在社會網絡中再傳播的過程。

總督府推動的春、秋季大清潔日對於居家環境衛生觀的建立與實踐，有其重要性。黃旺成每年在春、秋季大清潔日的生活體驗與記述，表露出總督府藉

133 其中以得到一種蛔蟲者最多，有3,088人，約53.59%；其次是同時得到蛔蟲、鞭蟲者，有1,206人，約20.93%；第三多的是同時得到十二指腸蟲（按：鈎蟲）、蛔蟲者659人，占11.44%；第四多的是同時得到十二指腸蟲、蛔蟲、鞭蟲者，有285人，4.95%。新竹州編，〈寄生蟲、原蟲、其ノ他地方病〉，《新竹州第九・十回保健衛生調查書》（新竹：新竹州廳，1932），頁58-59。

由地方衛生警察與保甲制度執行家屋衛生檢查的生動情境。這種強制推動臺灣民衆打掃與消毒店家的內外的衛生措施，逐步將居家清潔習慣植入大眾的日常生活之中。然而，誠如劉士永指出籠統地歸因於大清潔法與衛生警察進行家戶清潔檢查之功，可能也忽略了日本重視街道定時灑掃的習慣，是來自於其傳統習俗，環境衛生絕不只於疾病防治或一般性的灑掃清潔，而是一組有系統、有規範的環境衛生工程（sanitary engineering）。¹³⁴

因此，通過《黃旺成先生日記》雖然可以在傳主的目光領略其居家生活的場景，但是也受到黃旺成的興趣、焦點等主觀性限制，例如在官方出版物中強調的灑水車清掃街道等衛生工程或是家畜防疫措施等等面向，皆未見於黃旺成記錄於日記之中。日記的部分記述較為零碎與片面，對於熟悉的事物、人名、地名或隱諱難讀；又受到日記文本載體設計的限制，在字數上必須有所取捨，因而失於記載。因此日記的運用必須結合其他各類史料方能對研究對象加以釐清，同時放置在更大的脈絡進行理解。

最後，透過日記中居家環境衛生的記載，可以看到各類寄生蟲經常地出現在黃旺成的日常生活之中。顯露出大正時期除了面對瘧疾、登革熱等急性傳染性疾病，居家生活中更常面臨的是各種寄生蟲病，反映了當時家庭衛生與飲食衛生知識尚未齊備，因此日常生活中頻繁地上演著一場又一場的「蟲蟲危機」。

134 劉士永，〈日治時期臺灣公共衛生的發展與研究特徵〉，收入於祝平一編，《健康與社會：華人衛生新史》（臺北：聯經，2013），頁164-165。

引用文獻

1. 〈展覽會と新竹〉，《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15/3/25，7版。
2. 〈清潔展期〉，《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24/4/13，6版。
3. 〈愈愈本日から開會の新竹展覽會〉，《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21/10/28，7版。
4. 〈新竹の招魂祭と展覽會開館式〉，《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21/10/30，2版。
5. 〈新竹兩展覽會〉，《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21/10/26，5版。
6. 〈新竹展覽會 二館を延期して閉館 觀覽者數十萬餘〉，《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21/11/2，2版。
7. 〈臺中の衛展 九日から十日間〉，《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21/10/4，7版。
8. 〈熱鬧中之新竹〉，《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15/4/2，6版。
9. 〈衛生活寫〉，《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22/12/16，4版。
10. 〈衛生展覽會〉，《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15/4/1，7版。
11. 〈衛生展覽會閉會〉，《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15/4/7，7版。
12. 〈論衛生之要〉，《臺灣協會會報》46號，1903/7/20，頁69。
13. 上野齊，《普通衛生講話》。臺中：池ヶ谷榮吉商店，1923。
14. 小野芳朗，《「清潔」の近代：「衛生唱歌」から「抗菌グッズ」へ》。東京：講談社，1997。
15. 丸山芳登，《臺灣の衛生事情と其保健生活法》。臺北：杉田書店，1929。
16. 片岡巖著，陳金田譯，《臺灣風俗誌》。臺北：衆文圖書，1990。
17. 田邊操，《人體寄生虫病診療の實際》。東京：南山堂，1944。
18. 皮國立，〈「氣」與「細菌」的中國醫療史：民國中醫外感熱病學析論〉。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11。
19. 李尙仁，〈十九世紀後期英國醫學界對中國癩瘋病情的調查研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4卷3期，2003，臺北，頁445-506。
20. 李佳卉，〈日治時期臺灣「污物」處理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21. 李乾朗，《臺灣古建築圖解事典》。臺北：遠流，2003。
22. 邱秀堂，《臺灣北部碑文集》。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1983。
23. 佐久間左馬太，〈臺灣家屋建築規則施行細則改正〉，《臺灣總督府報》2243號，1907/7/30。
24. 佐倉孫三，《臺風雜記》，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107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

25. 沈佳姍，〈從《黃旺成先生日記》看臺灣民間的兒童疾病及照護（1912-1925）〉，《空大人文學報》27期，2018，新北，頁35-98。
26. 坪井次郎，〈臺灣の衛生〉，《臺灣協會會報》4號，1899/1/22，頁5-9。
27. 范燕秋，〈「衛生」看得見：1910年代臺灣的衛生展覽會〉，《科技、醫療與社會》7期，2008，臺北，頁65-128。
28. 范燕秋，〈日本帝國發展下殖民地臺灣的人種衛生〉。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01。
29. 范燕秋，〈由《水竹居主人日記》看殖民地公眾衛生之運作〉，收入范燕秋著，《疫病、醫學與殖民近代性》。新北：稻鄉，2005，頁151-178。
30. 范燕秋，〈從臺灣總督府檔案看日治時期的公眾衛生〉，收於國史館編著，《臺灣史料的蒐集與運用討論會論文集》。臺北：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2000，頁151-196。
31. 兒玉源太郎，〈大清潔法施行規程〉，《臺灣總督府報》1870號，1905/11/28。
32. 兒玉源太郎，〈臺灣家屋建築規則施行細則〉，《臺灣總督府報》829號，1900/9/30。
33. 金森辰次郎，〈一新寄生虫卵二就テ〉，《中外醫本新報》627號，1906，頁640。
34. 周婉窈，〈日據時代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臺北：自立報系文化出版部，1989。
35. 郭侑欣，〈清代臺灣文獻所反映的疾病經驗與文化想像〉。彰化：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11。
36. 唐贊袞，《臺陽見聞錄》，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30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
37. 陳宏文，《馬偕博士在臺灣》。臺北：中國主日學協會，1998。
38. 陳明達，〈日治時期臺中地區豬隻畜產改良之發展（1897-1945）〉。臺北：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
39. 陳柔縉，《鷓事臺灣》。臺北：東觀國際文化，2007。
40. 陳逢申，〈《黃旺成先生日記》序〉，收入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一）》。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8，頁iii-viii。
41. 許雪姬，〈編者序〉，收入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一）》。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8，頁ix-xii。
42. 張秀蓉編，《日治臺灣醫療公衛50年》。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社，2012。
43. 張建隆，《看見老臺灣》。臺北：玉山社，2004。
44. 張素玠，〈蟲蟲戰爭：海人草與臺灣寄生蟲防治（1921-1945）〉，收入范燕秋主編，《多元鑲嵌與創造轉化：臺灣公眾衛生百年史》。臺北：遠流，2011，頁129-176。
45. 張淑卿，〈防癆體系與監控技術：臺灣結核病史研究（1945-1970s）〉。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4。

46. 張麗俊，《水竹居主人日記（五）》。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
47. 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一）》。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8。
48. 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二）》。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8。
49. 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十）》。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2。
50. 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一）》。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3。
51. 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二）》。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3。
52. 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三）》。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4。
53. 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七）》。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0。
54. 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八）》。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2。
55. 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九）》。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2。
56. 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三）》。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9。
57. 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五）》。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9。
58. 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六）》。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0。
59. 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四）》。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9。
60. 董宜秋，《帝國與便所：日治時期臺灣便所興建及污物處理》。臺北：臺灣古籍，2005。
61. 曾品滄，〈物競與人擇：荷治與明鄭時期臺灣的農業發展與環境改造〉，《國史館學術集刊》14期，2007，臺北，頁1-37。
62. 曾品滄，〈從田畦到餐桌：清代臺灣漢人的農業生產與食物消費〉。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6。
63. 渡邊七治，〈塵芥漫談〉，《臺灣公眾醫事雜誌》3卷6期，1930，臺北，頁17-19。
64. 新竹州編，〈寄生蟲、原蟲、其ノ他地方病〉，《新竹州第九・十回保健衛生調查書》。新竹：新竹州廳，1932，頁58-59。
65. 新竹州編，《新竹州保健衛生調查書綜合表》。新竹：新竹州衛生課，1934。
66. 臺中警務部衛生課，《保健組合事業概況書》。臺中：臺中衛生課，1939。
67.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編，《記念臺灣寫真帖》。臺北：臺灣總督府民政部，1915。
68.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臺灣衛生要覽》。臺北：臺灣總督府警務局，1925。
69. 劉士永，〈「清潔」、「衛生」與「保健」：日本時代時期臺灣社會公眾衛生觀念之轉變（修訂稿）〉，收入李尚仁主編，《帝國與現代醫學》。臺北：聯經，2008，頁271-323。
70. 劉士永，〈日治時期臺灣公共衛生的發展與研究特徵〉，收入於祝平一編，《健康與社會：華人衛生新史》。臺北：聯經，2013，頁164-165。
71. 劉士永，〈日治時期臺灣地區的疾病結構演變〉，《新史學》13卷4期，2002，臺北，頁165-208。

72. 劉士永，〈從血絲蟲到瘧原蟲：從風土病類型轉移看臺灣西部平原之開發〉，收入王利華編，《中國歷史上的環境與衛生》。北京：三聯書店，2007，頁393-423。
73. 劉士永，〈「清潔」、「衛生」與「保健」：日治時期臺灣社會公眾衛生觀念之轉變〉，《臺灣史研究》8卷1期，2001，臺北，頁41-88。
74. 劉翠溶、劉士永、顧雅文，〈以寄生蟲病做為二十世紀臺灣環境變遷的一項指標：初步探討〉，收入劉翠溶主編《自然與人為互動：環境史研究的視角》。臺北：聯經，2008，頁523-590。
75. 盧德嘉，《鳳山縣採訪冊》，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73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
76. 戴文鋒，〈《海關醫報》與清末臺灣開港地區的疾​​病〉，《思與言》33卷2期，1995，臺北，頁157-213。
77. 謝金鑾、鄭兼才，《續修臺灣縣志》，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140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
78. 蘇芳玉，〈清末洋人在臺醫療史：以長老教會、海關為中心〉。桃園：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79. 蘇芳玉，〈清季臺灣地區疾病的治療與觀察：外國海關醫員的觀點〉，《中央大學人文學報》40期，2009，桃園，頁1-54。

From The Diary of Ng Ong-Seng to See the House Cleaning and Household Hygiene in Taiwan during the Taishō period

Chao-kai Li*

Abstract

With reference to The Diary of Ng Ong-Seng, this paper observes the evolution of house cleaning and household hygiene during the Taishō period. On the one hand, it reveals that the Japanese colonial government has cultivated Taiwanese household hygiene concepts through the primary school education and the health education exhibitions. On the other hand, it can also be seen in the process of re-dissemination of health knowledge in social networks. Next, it explains the importance to the practice of household hygiene in spring and autumn “Big Cleaning Day” promoted by Japanese colonial government. This hygiene policy that compels Taiwanese people to clean has gradually embedded the habit of house cleaning into daily life. Finally, through The Diary of Ng Ong-Seng, the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various parasitic diseases were more commonly faced in daily life during the Taishō period.

Keywords: Taishō period, daily life, house cleaning, household Hygiene, “Big Cleaning Day”

* Associate Professor, Mazu Culture Research Institute, Putian University

Received: Aug. 15, 2020; Accepted: Apr. 16, 2024